
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初探

王 真

抗日战争期间，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来，抗战爆发后，中苏关系一直较好。1937年8月，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不仅从道义上，而且从物资、技术和人力方面都给中国抗战以很大支援。中国对此也深表感谢。但是，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后，两国关系迅速逆转，日渐冷淡，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在新疆地区）。对于这种关系恶化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未进行专门研究。本文不揣谫陋，试对此作一浅析，以为引玉之砖。

一、两国关系恶化的因素

抗战期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因素较多，归结起来，主要如下：

1. 苏联停止援华。抗战全面爆发后，苏联曾积极援助中国。1938至1939两年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三笔低息贷款，计2.5亿美元^①，用于购买苏联军火，价格可低于国际市场。苏联还派遣大批志愿飞行员、军事顾问、各方面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来华，直接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的军事指挥、训练、作战，以及从事专业技术的指导和具体工作^②。此外，苏联从道义上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罪行的谴责，对中国抗战的声援，也给予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但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中国的人力、物力援助逐渐停止了，有关中国抗战的报道也日趋减少。国民党对此表示不满。

2. 中德关系的影响。国民政府在1941年12月9日对德宣战前，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如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聘请德国的赛克特等人作“剿共”顾问；抗战爆发后，

① 苏联援华贷款的实际动用总数为1.73亿美元，见李嘉谷《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贷款与军火物资援助》，《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 抗战期间，苏联派遣各方面援华人员计5000余人。参见Ю. В. 丘多杰耶夫《在华苏联顾问（1937—1942）》，《远东问题》（俄文版）1988年第2期。

蒋介石又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关系。这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并未影响到中苏关系。但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中德关系就极为敏感了。尤其是国民党曾幻想德军获胜及得到德国的援助，并为此在中德断交前夕进行了一系列亲德抑苏的外交活动，甚至在报刊上发表反苏言论，引起苏联的愤懑，认为这是在破坏苏联的威望，援助苏联的敌人。

3. 国民政府强求苏联对日参战。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全力以赴抗击德军，故极力避免两线作战，卷入对日战争。国民政府不为苏联着想，强人所难，三番五次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使苏联感到这有挑拨日苏战争之嫌，因而极为反感，拒绝了国民政府的要求。而国民政府则认为，这是苏联疏远两国关系的不友好的表现。

4. 国共两党冲突的影响。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国民党的内外政策逐渐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顽固派先后三次挑起反共高潮，加剧了国内形势的危机，苏联对此极不赞成。特别是1941年国民党制造的大规模围歼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苏联是坚决反对的。苏联的这种正义立场却遭到国民党的反对，被看作是有损两国关系的表现。后来台湾学者这样评论：“中苏关系自1940年以来因政府部队和中共部队不断增加的冲突而一直在恶化”^①。

5. 新疆问题。1924年中苏建交后，苏联与中国新疆地区的关系也随之建立起来。在杨增新、金树仁主新期间，中苏在新疆的关系基本正常，即使在1929年中苏断交后，两国仍在这一地区保持经济贸易往来。1933年4月，盛世才任新疆省主席、边防督办，得到苏联的支持。苏联曾出兵支持盛世才平定马仲英部暴乱；盛世才也宣布反帝亲苏的六大政策，因此，盛与苏关系一直比较融洽。抗战初期，新疆成为中国取得苏联援助的重要交通线，新疆的形势也是稳定的。新疆问题的发生，据国民党方面讲，是始自1940年6月苏联吞并唐努乌梁海地区和同年11月逼签新疆锡矿协定。继而，国民政府在1942年7月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去新疆表示支持盛世才。9月，又派宋美龄去新疆祝贺统一，要求苏联撤退驻在乌鲁木齐的苏军第八团和飞机装备厂，苏与盛世才关系乃至中苏关系开始恶化^②。苏联指责国民党，自1942年春起在新疆掀起反苏反共浪潮，迫害、驱逐苏联侨民，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削减甚至中断新疆同苏联的贸易，造成新疆地区形势紧张。1943年底至1944年上半年，新疆地区的冲突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双方动用了军队。苏联撤回在新疆的顾问、专家和商办代表，停办新锡公司，运回矿山设备。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军开进新疆。由此可见，新疆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6. 苏日中立条约问题。该条约是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其主要内容是

① 程天放：《中俄关系史》(Tien-fang Cheng, 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华盛顿1957年版，第220页。

② 参见薛光前《八年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湾1978年版，第404页。

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关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苏联认为这一条约有效地维护了远东和平，便于后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但国民党对这一条约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实际上帮助了日本，使日本得以把关东军调往关内，增加中国抗战的压力。特别是条约的附带声明指出，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被认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国民政府曾表示强烈抗议，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承认第三方之间缔结的有损于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任何协定”^①。苏日中立条约给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用签订这一条约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话说，该条约冷却了中苏关系。^②

恩格斯指出，历史事变是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产生出来的一个总的结果。^③如果把中苏关系从稳定走向破裂的过程看作是一种合力运动，国民党和苏联则是这种合力运动中的两支基本分力。下面就试析这两方面的作用。

二、国民党的作用

首先应当看到，国民党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是一种相对不稳定的因素，在它同苏联关系的历史上，始终如此。1927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继续保持了北洋政府同苏联的外交关系，但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亲帝反苏。1927年12月，国民政府以苏方人员参与广州起义为借口，下令撤销各地苏联领事馆。勒令各地苏联商业机构停业。1929年7月，国民党东北地方当局制造了中东路事件，驱逐逮捕苏方人员。8月至11月，东北军又与苏军在中苏边境频频发生武装冲突。中东路事件导致中苏断交。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此时，尽管中苏已经绝交，但苏联在外交上、道义上和行动上都给中国以同情和支持，认为日本的侵略对中苏两国都是严重威胁，中苏两国应当联合起来，协力制敌。1931年9月24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向日本提出口头警告说：“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④苏联对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中国民众也确实给予了一定的支援和保护。为使两国关系正常化，苏联提议中苏应立即复交。国民党内以汪精卫、张群为代表的亲日派反对复交，怕引起日本不满；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主张复交，认为这样可以对日本在华势力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并由此引起苏日之间的冲突。蒋介石正是从宋、

① 程天放：《中俄关系史》，第220页。

② 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62页。

③ 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④ 塔斯社电讯，见1931年9月26日上海《申报》。

孔的考虑出发，同时也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才同意国民政府于1932年12月12日同苏联复交。

复交后，国民党极力想从苏联得到援助，因为英美这时尚不肯援华抗日。1935年2月8日，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同苏联驻英大使曼伊斯基会晤时就谈到这一点。郭泰祺说：“中国经常不断地寻找支持并指望西方国家（这里指国联，特别是美国）的援助。中国特别对英国和美国寄以希望，因为它比其它国家更为关心远东事务，比其它国家更有能力帮助中国人民保卫自己的独立性。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西方实际上没为中国做什么事。国联只限于信守决议，可这决议并不能阻止日本夺取满洲。通常所谓对中国很友好的美国人，在过去三年内实际上对中国也没有表示过任何的友谊。他们发表了抗议书，日本外务省置之不理，美国再没有进一步采取什么行动。”他还说，英国政府“不比美国好。他同样用好话和决议安慰中国。但当事情弄到这样地步时，他又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总之，现在中国的情绪是这样的，讨厌西方”^①。

英美的冷淡使国民党只好求助于苏联。还在1934年6月，蒋介石得知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将利用休假期间赴欧洲考察，就嘱其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苏联，^②为尔后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作准备。同年10月1日，蒋廷黻同苏联副外长斯托莫尼亚科夫会谈时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他说：“7月27日，我从中国动身前，蒋介石召我到南京，他要我转达以下意见：蒋介石认为中苏之间有一系列共同利益联系着。他认为，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任何打击或损失，这同样意味着对中国的地位和利益的打击。他很想弄清楚，苏联政府对涉及我们两国相互关系这些想法是否抱有同感。”^③斯托莫尼亚科夫即表示，苏联过去和现在都对中苏怀着真挚友好的感情。蒋廷黻又试探性地询问，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破裂，“这不会影响今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吗？”斯托莫尼亚科夫回答：“我不愿在过去中苏关系中纠缠。大家都十分清楚，合作时期后破裂中苏关系的首先是中国政府。但过去是过去，我们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回忆和感情上。在决定我们同中国今天的政治关系时，特别在决定同在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时，自然我们决不会从回忆过去和感情出发，而是要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并真诚地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我们象对待其他同我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对待他，也象尊敬其他同我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的因素，任何成见都不能给我们这个立场以不好的影响。”^④蒋廷黻这才如释重负，连忙说：“我可以使你们相信，苏联政府

① 《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第70—71、72页，本文所引《苏联外交文件》均转引自季托夫《1935—1936年南京政府同苏联的谈判》，杨圣清译，载《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② 参见严君《蒋廷黻生平事略》，载《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

③ 《苏联外交文件》第17卷，第641页。

④ 同上书，第642页。

这些观点是蒋介石所不了解的。我将立即把我们谈话的内容报告他，并使他相信这对未来的中苏两国关系具有巨大意义。”^①不久，蒋廷黻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写道：“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利害既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②蒋介石看后甚喜，即让孔祥熙密告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廷黻与中正有深密关系，极为信赖，嘱其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开诚洽谈”^③。蒋廷黻的这次莫斯科之行达到了蒋介石的预期目的，以后蒋介石便谨慎地通过官方途径改善两国关系。1935年初，国民政府令尚滞留在渝的驻苏大使颜惠庆返回莫斯科，以示对苏政策的转变。同年10月，中苏文化友好协会成立。接着，国民政府又向苏联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军事协定的建议，并派陈果夫前往莫斯科商谈苏联援助事宜。与此同时，蒋介石、孔祥熙、分别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要通过新疆获取苏联军援^④。1935年11月15日，斯托莫尼亚科夫电鲍格莫洛夫转告中国政府：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⑤。12月24日，鲍格莫洛夫又受命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准备同中国方面就缔结双边协定问题进行具体讨论^⑥。

然而，当苏联答应国民政府的上述要求，为改善中苏关系而竭诚努力时，后者却止步不前了，蓄意拖延关于缔结协定问题的谈判。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党怕影响同日本的关系。它既想同苏联结盟，以抗衡日本；又不想立即正式结盟，以免导致日苏关系紧张进而刺激日本，加深中日矛盾，因而采取的策略是在中、日、苏三角关系中搞平衡。国民政府在同苏联改善关系时，又与日本进行谈判。1936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外长张群在向记者宣布他与日本驻华大使有田的会谈情况时说：“回溯此四次谈话，虽未获得任何具体结论，但双方有此机会，畅聆彼此见解，于将调整中日关系之交涉，不无裨益”^⑦。蒋介石在同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日本要求谈判，我们当该同他进行谈判，因为日本是有力量的。但是如果我们同你们达成协议，我们同日本的全部谈判就会丧失意义”^⑧。1937年6月18日，国民政府新任外长王宠惠在南京答日本记者问时再次表明了对日本的亲善态度。他说，基于平等互惠之原则，深信调整中日邦交不难于短期内实现；中日经济合作如因政治问题悬而不决，恐难有良好结果^⑨。国民政府既然希望中日和好，也就不打算中苏关系过于密切，以致

① 《苏联外交文件》第17卷，第643页。

② 严君：《蒋廷黻生平事略》，《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

③ 《1933—1934年蒋介石来电》，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⑤⑥ 《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第662、663、590页。

⑦ 张蓬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⑧ 《苏联外交文件》第19卷，第37页。

⑨ 参见贾丕才《苏中关系》（俄文版），莫斯科1958年版，第228页。

使其成为妨碍中日邦交的“政治问题。”这种平衡外交策略，反映出国民党对苏联的不完全信任和对日本改变其侵略政策的幻想。

国民党不愿立即同苏联缔结协定的另一原因，是双方在中共和红军问题上的分歧。苏联希望国民党与中共领导的红军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打击日本。但国民党要求苏联充当国共关系的调解人，迫使中共和红军首先承认国民党的权威。苏联以不干涉国内政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①。1936年下半年至1938年春出任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蒋廷黻，在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报告中曾谈到苏联的这种态度。蒋廷黻对鲍格莫洛夫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说：“你知道苏俄态度不仅影响中国共产分子，即不信共产主义者亦有不少人士对苏俄怀有好感。至于用何种方法促进圆满解决，我无建议。我所请者即用尽苏联之道德力量。”^②然而，苏联却表示无从帮助。这在国民党看来，苏联并非真心支持自己，因而也就不愿最后下决心接受苏援并同其缔约。正如苏联史学家季托夫所评论：“蒋介石更多的是对调整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感到不安，因为没有这一点他便不能希望签订对他极其需要的中苏互助协议”^③。

国民党这种从一己私利出发的政策，不可能彻底改善中苏邦交，对国家和民族也极为不利。1940年，孙科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回顾九·一八这段不幸的历史，“觉得假使当时中苏关系不恶化，十六年（1927年）没有反共绝苏的事件，两国能维持友好的革命外交关系，以苏联为与国，也许敌人对我不敢发动侵略。因为敌人知道已与其革命过程中的唯一与国断绝关系，乃胆敢肆其侵略野心”^④。后来宋庆龄也就此事谈到：“在七七事变前，苏联曾建议和中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如果在那时候，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敢侵略我们，千百万同胞的生命可免遭牺牲，祖国的大地可免遭蹂躏，但是中国反动派拒绝了这善意的建议，使我们遭受了十多年的流血牺牲，阻碍了我们建设和进步”^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的“平衡”策略破产，而英美这时又推行绥靖政策，它才不得已转向苏联，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接受苏联的援助。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中苏关系必然是不稳定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逐渐停止援华，这使依赖外援打“廉价战争”的国民党必然寻求新的靠山。恰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蒋介石面前，并陆续采取了一些使蒋介石颇感兴趣的政策。例如，中美租借法案，使国民党可以得到大量美援；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使蒋介石可以得到外交上的虚荣。这样，国

① 《苏联外交文件》第19卷，第37页。

② 《蒋廷黻关于苏联概况、外交政策及中苏关系问题致外交部报告》，《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

③ 季托夫：《1935—1936年南京政府同苏联的谈判》，《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④ 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1942年版，第12页。

⑤ 《宋庆龄副主席谈话》，1950年4月14日上海《文汇报》。

国民党就日益亲美，而对中苏关系的破裂便无所顾忌了。苏联方面当时对此很有看法，说中国现在有了美国这个靠山，就把苏联全然抛在脑后。国民政府外交官顾维钧则评论：“此话不假”^①。1942年10月，蒋介石把“亲苏派”人物、驻苏大使邵力子召回，也说明了这一点。时任驻苏陆军副武官李修业后来回忆说，自邵力子奉调回国，“中苏友好关系日益减退”^②。

国民党在中苏关系中的不稳定性，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与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有着本质上的联系。早在1936年5月19日，斯托莫尼亚科夫就告诉鲍格莫洛夫：“最近，我们收到来自各方面关于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消息。我想，他在任何条件下都认真地进行着这个准备。但他的主要路线是继续力求赢得时间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得到外来的援助，首先是英美和国联的帮助”^③。斯托莫尼亚科夫对国民党外交政策重心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很明显，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社会制度还是意识形态上与中国都是根本对立的，这使国民党对它具有强烈的排拒性。国民党之所以同苏联建立互助关系，完全出于形势所迫；这种互助关系也不可能改变它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苏德战争初期，国民党对苏联失利就持幸灾乐祸态度，对德军获胜深信不疑。在德国外交人员撤离重庆时，何应钦特设宴欢送。席间，德国人称，当德军打到中亚细亚时，将修建一条铁路通至甘肃，并要帮助中国实行法西斯制度。何应钦等人则表示，德国必胜，日本亦必胜，对德绝交实属错误。一些亲德人士扬言：中国要与英美绝交，废止滇缅路修筑协定，以人力物力供应德日两国。^④不仅如此，国民党CC派报纸还刊登抑苏扬德的言论，攻击苏联的社会制度，把苏军的暂时失利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社会主义得到群众支持要比资本主义得到的少”等等^⑤。显而易见，站在这种立场上对待德苏战争的国民党，绝不可能维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在新疆问题上国民党也如此。1942年，盛世才在新疆制造反革命暴乱，断绝同苏联的关系，转而投靠蒋介石，蒋即表示对他的支持。1944年曾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后来这样评论新疆事件：“盛世才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行动的”^⑥。不管盛世才在政变前是否与蒋介石有过直接联系，但他们在反苏反共的本质上一致。这也决定了国民党不会同苏联保持长久而稳定的关系。

既然国民党在对苏外交上具有这种不稳定性，一旦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就会加剧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0页。

② 《和平老人邵力子》，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③ 《苏联外交文件》第19卷，第270页。

④ 据新华社重庆1941年7月24日电，见《何应钦认敌为友》，1941年7月26日《解放日报》。

⑤ 贾丕才：《中苏关系》，第309页。

⑥ 同上书，第315页。

这种不稳定性，导致双方关系破裂。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即是一种外来因素，它不仅使国民党不能继续得到来自苏联的援助，而且由于苏军在战争初期的失利大大降低了苏联的威望，促使国民党改变对苏政策。苏联拒绝国民政府对日参战的要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应予以理解，但国民党认为这是不友好的表现。苏联指责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义正辞严，同样引起国民党的不快，加深了同苏联的裂痕。至于苏联吞并唐努乌梁海，逼签锡矿条约协定和在苏日中立条约中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当然也是关系破裂的因素，国民政府为此提出抗议是有道理的，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详加论述。

这里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唐努乌梁海、锡矿协定和苏日中立条约等问题并非是破裂中苏关系的主导因素。在国民党统治的22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多次侵犯中国主权。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于日本铁蹄之下；1933年的塘沽协定，1935年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又使日寇侵占了华北大片领土，国民政府并没有因此断绝同日本的关系。1946年，国民党为打内战，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商约、中美海军协定和中美航空协定等一系列卖国条约和协定，也没有表示丝毫的忏悔之心。就中苏关系而言，1945年中苏谈判时，苏联要求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失去的权益，国民政府也未因此而同苏联订立条约。国民党有时虽也打着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旗号，甚至采取一些实际行动，但这绝不是它对外政策的本质。它的本质是亲帝联帝（主要是英美），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国家领土和主权则在其次。所以，唐努乌梁海、锡矿协定和苏日中立条约等问题虽然影响到国民党的对苏政策，但不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决定因素。况且国民党对其中的某些事情还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国民政府要员程天放所著《中俄关系史》一书就锡矿协定等事这样披露道：“南京政府很了解盛（世才）同苏联的关系，但容忍了他，因为害怕把盛的职务解除，他将公开叛变，并且南京政府也没有力量来镇压他，盛的手既可与日本又可与共产党搀起来。后来，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向重庆的军事供应经过新疆，国民党政府很少既想得罪苏联又得罪盛”^①。这一方面揭示了国民党对盛世才的权谋策略，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它的外交政策中，确有比国家主权更为重要的问题。再如，国民党对苏日中立条约也仅是在外交上提出抗议而已，并未采取破裂关系的行动。而关系破裂是在1942年新疆事件以后，此间相隔一年之久。可见，国民党把中苏关系恶化之主因归咎于唐努乌梁海等问题，有违于客观事实。

三、苏联的作用

1932年中苏复交后，苏联在改善中苏邦交方面是比较积极的。复交第二年，苏联

^① 程天放：《中俄关系史》，第177页。

外长李维诺夫即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席演说时指出，苏联已接受中国政府关于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条约草案正由中国政府讨论。他还说：“我们严守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同时对于中国为独立及国家统一之奋斗表示最大的同情”^①。1935年8月19日，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在对等原则基础上成立苏中航航空公司，共同管理从苏联边界经乌鲁木齐、哈密、兰州、西安、南京至上海的航线^②。是年8月，苏联政府还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遭受水灾的中国居民捐赠了一笔款项。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苏联便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如前所述，从物资、人力和道义上给中国以大力支援。对苏联的这一援华政策，即使后来，国民党也不否认。1944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撰文说：“七七以后，直至1941年苏德战争前，整整四年间，我们作战所需的物资，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苏联同时在革命精神和人类道义上寄予我们以无限的同情和鼓舞……”^③。苏联的援华政策，有助于抗战初期中苏关系的相对稳定与和睦友好。

那末，苏联后来是否要恶化这种关系呢？我们可以结合恶化因素作一分析。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停止援华，这标志着苏联对华政策的一种转变，但并不意味着苏联要恶化两国关系。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向全苏发表广播演说指出，苏德战争关系到“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有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④。因此，苏联集中全力反击德国入侵是完全必要、刻不容缓的，停止援华也无可非议。1944年5月，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因病回国前夕谈到中苏关系时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未能给予中国援助，是由于苏联的注意力放在事关国家命运的欧洲，但很明显，许多中国人对此不理解^⑤。非但如此，国民党在苏联停止援华后还蓄意进行报复，缩减中苏商品贸易额，使苏联不能得到更多的马匹、毛皮、羊毛等必需品和原料。据统计，从1941至1945年，苏联从中国少得到价值225万美元的商品^⑥。两相对照，苏联却表现出一定的宽宏大度。在它停止援华后的一段时间里，仍有相当一批军事顾问，象П.И.巴托夫、А.В.瓦西里耶夫、М.И.潘克维奇、С.С.奥格涅夫、А.К.别列斯托夫、М.В.维诺格拉多夫、В.И.崔可夫等人继续在中国工作^⑦。直至1942年2月，因蒋介石奉行亲美政策，美国顾问陆续来华，苏联顾

① 参见《苏联与中国的互不侵犯条约》，1937年9月1日《救国时报》。

② 参见季托夫《为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1937)》，《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③ 《中苏文化》1944年第7期。

④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俄文版），莫斯科1952年版，第13页。

⑤ 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4年 卷6 中国》（英文版），华盛顿1976年版，第793页。

⑥ 参见贾丕才《中苏关系》，第309页。

⑦ 参见丘多杰耶夫《在华苏联顾问(1937—1942)》。

问才最后撤离。

与援华问题相联系，是苏联拒绝国民政府要求它参加对日作战。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曾多次要求苏联立即参加对日作战。1941年7月15日，国民政府外长郭泰祺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晤，提议中苏就军事合作进行谈判，要求苏联对日参战^①。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当天即提议缔结中、美、英、苏、荷五国军事协定，共同对日本采取行动，并特别希望苏联对日参战^②。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社在发自伦敦的一则消息中，以赞同的态度转述了英国政府的主张，说“英政论家主张，苏联应对日宣战，苏可不费气力袭击日本”^③。12月20日，《扫荡报》在《为苏联新胜利欢呼》这篇评论中再次呼吁苏联参战。文中写道：“我们更愿指出这一点，苏联在苏德协定下曾有6月22日被袭的痛苦经验；日寇既是希特勒的一伙，苏联当不容许日寇在苏日中立协定下蹈袭希特勒的故智。因此，我们确信苏联将断然在远东采取必要措置，以与其在西方的新胜利相配合，完成其在反侵略阵营中的任务。”12月31日，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傅秉常又在《扫荡报》上发表声明，表示对日苏战争“感兴趣”，相信这场战争不可避免，等等。国民政府的这些要求根本没有考虑到苏联的实际情况。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德矛盾成为苏联的主要矛盾，两国军事实力又不相上下，甚至德国略强。1941年6月，德国用于进攻苏联的力量即达460万人。战争初期，苏联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受很大损失，招架之功尚有，还手之力却无，根本谈不上再对日出兵。因此国民政府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从实际情况看，苏联为集中力量反击德寇，在二次大战初期和中期都极力避免引起同日本的矛盾。1943年盟国召开会议时，首先是中、美、英在开罗会晤，而后是美、英、苏在德黑兰会晤。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分为苏联阶段和中国阶段，也有这个因素。正如曾任莫洛托夫外长助理的别列日柯夫所说，当时苏联“一直对日本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经常使日本感到苏联决不敌视日本”，因为在苏德战争之际，即使日本“在边境地区进行一次一定程度的攻击，收效也会不小”^④。尽管苏联当时囿于自己的困境而拒绝了国民政府的要求，但并没有改变对日参战的根本立场。1941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复电蒋介石时说，在适当的时机，“苏联当然必须与日本作战，因为日本必将无条件的破坏中立条约”^⑤。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果然参加了对日作战，从而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这充分说明，苏联是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可靠盟友。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苏联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坚决反对国

①② 参见杜宾斯基《日中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俄文版），莫斯科1980年版，第163页。

③ 1941年12月12日《扫荡报》（重庆版）。

④ 瓦·米·别列日柯夫：《二战期间斯大林与苏联的对外政策》，《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2期。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二）》，第391—392页。

共内战，主张团结抗日。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大肆杀戮新四军抗日将士。这一反共暴行受到苏联的严厉谴责。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就皖南事变发表声明：国民党进攻新四军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军事力量，这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并警告内战对抗战的危险性^①。同日，蒋介石在会见潘友新时，企图向新四军栽赃违反“军纪”、“袭击”友军的罪名，潘友新当即反驳道：新四军为数不过六七千人，怎么敢进攻邻近之大军（指国民党军队）？^② 蒋介石只得顾左右而言它。苏联驻华武官在会晤何应钦时，曾问及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并指责：现在正和侵略者打仗，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何应钦支吾搪塞，闪烁其词^③。1943年底以后，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报刊陆续发表谈话和记录，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1944年6月10日，斯大林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会晤时，就中国内政发表评论说：蒋介石应该同中共在北方达成协议，以便大家能够在对日战争中团结起来，停止相互间的仇视，促使国内政治自由化。斯大林还说，蒋介石的一个最大错误是拒绝利用共产党打敌人，这是一种愚蠢的政策。他不是利用他们对付日本人，而是以思想体系为依据，继续同他们进行争论^④。著名远东问题评论家阿瓦林在1944年12月的《战争与工人阶级》上撰文指出：“从所有来自中国的证据和这一国家发生的事件判断，反动地主、投机商和军阀近年来明显地在国民党领导中增加了。决定军事战略的最后发言权让给了这样一些将军，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招牌下隐蔽了他们的亲日情绪，象叛国者鼻祖汪精卫那时干得一样”^⑤。这些情况表明，苏联是不主张中国打内战的，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深为不满。因为国民党实行这种政策，显然要严重妨碍对日作战；而一旦中国对日作战不力，又会影响到苏联集中全力进行卫国战争。但国民党不肯接受苏联的劝告，一意孤行，这自然要影响到两国关系。

同样，在中德关系问题上，苏联也有理由指责国民党的不友好举动，因为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伤害了中苏两个盟国间的感情，不利于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

当然，苏联的对华政策也并非一贯正确，完全符合国际准则的，尤其是在新疆问题和苏日中立条约问题上。在新疆问题上，主要是苏联强占唐努乌梁海，将其并入苏联版图。唐努乌梁海自唐朝以后中国就在那里设置过行政机构。苏联出兵强占，不论出自何因，都系侵犯行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表

① 参见贾丕才《苏中关系》，第291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二）》，第387页。

③ 参见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6—58页。

④ 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4年 卷6 中国》，第799页。

⑤ 引自查尔斯·B·麦克莱恩《苏联的政策和中国共产党人 1931—1946》（英文版），纽约1958年版，第17页。

现,必然给两国关系带来严重后果。其次,是苏联与盛世才签订锡矿协定问题。1940年11月,斯大林派巴库林到乌鲁木齐与盛世才密谈后签订了这一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在新疆有勘探和开采锡矿及其辅助矿物的专权,还可设立营业处、仓库、宿舍、医院、学校、电站、铁路、公路等等,并规定用于这些设施的材料和装备在头十年内入疆时免税,所开采的锡矿和辅助矿物出口亦免税,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新疆可自由居住。这一使苏联享有极大权益的协定是苏联与盛世才背着国民党中央政府签订的,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盛世才由于从苏联得到不少好处,并慑于其压力,在协定上签了字。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蒋介石召见潘友新大使时曾明确指出:“贵国政府对于凡关新疆之事应与敝国中央政府交涉,不可与盛督办径行谈判。”^①言辞中虽含有对盛世才庇护之意,却也明显地强调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

苏日中立条约问题同样反映出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苏联为了远东边境的安全和应付紧张的欧洲局势,同日本订立中立条约的策略是正确的,条约的积极作用已为历史所证明。问题在于苏联不应用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作交易,与日本互相划分势力范围。众所周知,“满洲国”是伪政权组织,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外蒙古与中国历史渊源也是众所周知的,1924年中苏协定对此已有明确条文,苏联同日本在条约中却以“满洲国”和外蒙相互授受,显系侵犯中国主权。苏联并非不知道,日本制造“满洲国”的目的是要使其脱离中国而“独立”。就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苏联于10月19日发表声明说:“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它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②。苏联《消息报》还就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评论说:“该报告书表面承认中国主权,实际建议使满洲脱离中国,变为殖民地,凡外兵枪锋所及,即应使之立于国际共管之下。被报告书承认日本之特殊权益及利益,不限于满洲而远及内蒙、热河。……”^③由此可见,苏联对“满洲国”的实质和危害是十分清楚的。苏联当时谴责侵略、伸张正义的做法曾受到中国人民的赞赏和欢迎。但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时,苏联的立场和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必然损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直接影响到两国关系。即使完全从策略意义上考虑,苏联承认“满洲国”也并非缔约的必要条件。战后,日本史学界较权威的看法是,日苏中立条约“谈判的焦点是北库页岛利权问题”^④。在日本当时拟定的调整日苏邦交的六项条件中,也没有明确提到要求苏联必须承认“满洲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二)》,第436页。

② 《东北日祸反响录》,《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③ 引自李新、彭明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4页。

④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第662页。

国”^①。这六项条件最主要的是要苏联出卖库页岛北半部，从而兼并整个库页岛。但苏联拒绝接受这一条件，直至缔约当天，即4月13日，日本才被迫作出让步。“满洲国”问题是日苏两国发表缔约声明时加上去的，并非缔约本身的必要条件。退一步说，如果苏联担心因条约不能缔结而影响远东局势，应以日本所提六项条件为基础，作出让步，而不应以承认“满洲国”为交换条件。1918年，列宁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曾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德国的条件很苛刻，要求大量割地赔款。列宁答应了，但割的是自己国家的领土，其中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部分地区共15万平方公里^②。后来取消赔款条件，割地面积增加到100万平方公里^③。列宁的这一做法已被视为国际共运史上讲究革命策略的范例。但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时，斯大林只汲取了列宁的灵活性，即善于妥协，而违背了列宁的原则性，即不损害第三者利益。因而，这必然造成同第三者的矛盾。国民党抓住这一点抨击苏联，不无道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东北确是苏联后来帮助解放的，但这不能掩盖苏联缔结中立条约时在“满洲国”问题上的错误。实际上，苏联正是在1945年4月废止了包括有承认“满洲国”条文的中立条约，才有可能对日出兵。

* * * *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之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对苏政策的不稳定性。孔祥熙曾坦率地承认，中国方面许多令人不快的行动是与莫斯科关系恶化的原因。诸如支持新疆反动政变，中德关系问题，挑起国共冲突，抱怨苏联停止援华和苏联没有对日参战等。其中，国民党对盛世才新疆政变的支持是更为主要的因素，中苏关系的真正恶化正是在此以后。苏联对华政策中的错误，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诱因，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责任编辑：徐思彦）

〔作者王真，1949年生，大连海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讲师。〕

① 六项条件是：1. 通过德国调停，促使苏联出卖库页岛北半部。2. 帝国承认苏联在新疆、外蒙的地位，苏联承认帝国在华北、蒙疆的地位。新疆、外蒙和苏联的关系，由苏中双方商定。3. 使苏联放弃援蒋活动。4. 在满、苏、外蒙之间迅速成立勘定国界与处理边界纠纷委员会。5. 渔业谈判可根据建川提案寻求妥协。不过，为了调整日苏邦交，如有必要，不放弃渔业权。6. 为了日德通商，要使苏联同意提供运输相当数量货物所需的车辆，并降低运费。见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4页。

② 参见萨姆诺索夫主编《苏联简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95页。

③ 参见顾声说等《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